

村干部领导力如何影响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

易裕元, 陈芙蓉, 刘彩艳, 赵一夫*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基于15个省(区、市)5971份农户微观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村干部领导力通过农民村庄认同感和民主参与两个渠道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57.3%和9.0%,链式中介效应占11.1%;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应选优配强村干部队伍、增强农民村庄认同感和完善民主参与机制,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关键词: 村干部;领导力;乡村治理效能感;村庄认同感;民主参与

中图分类号: F325.4; D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4)04-0059-10

How does village cadres leadership influence farmers' sense of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YI Yuyuan, CHEN Furong, LIU Caiyan, ZHAO Yifu*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microdata from 5971 farmers across 15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this study us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village cadre leadership on farmers' perceptions of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village cadre leadership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se perception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leadership exerts both independent and chain mediation effects through two channels: farmers' sense of village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The independent mediation effects account for 57.3% and 9.0% of the total effects, respectively, while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s contribute 11.1%.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mpact of village cadre leadership on farmers' perceptions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an in the western reg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select and strengthen the village cadre team, foster a stronger sense of village identity among farmers, and refine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village cadres; leadership; sense of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village identification;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涌现出了诸如“枫桥经验”“桐乡模式”等乡村治理典型。然而,放眼全局,乡村治理仍然面临基层政权“悬浮化”^[1]、治理模式“碎片化”^[2]和农民主体“边缘化”^[3]等诸多挑战。其中,农民主体性问题关乎乡村治理根基和乡村振兴成败,尤为值得关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坚持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基本要求。因此,要

收稿日期: 2024-05-05

基金项目: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10-IAED-06-2024); 中农办、农业农村部软科学课题(202216)

作者简介: 易裕元(1997—),男,江西宜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为通信作者。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有必要从农民视角出发,及时了解和回应农民的治理需求,努力增强农民的乡村治理效能感^[4]。

村干部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肩负着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乡村经济、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等重要职责^[5],是增强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关键依托。从实践来看,随着党中央对基层党建工作的日益重视,村干部能力的培育和提升逐渐成为改善农村基层治理、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抓手。从学界来看,村干部素养对乡村治理影响的相关议题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有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村干部通常对国家政策理解得更加透彻,会积极寻找合适的优惠政策或发展契机,为农民提供更多增收渠道^[6,7];有过从商经历的村干部通常拥有较强的经济能力、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提高村庄资源获取能力和经济发展能力^[8],是推动村庄发展的核心力量^[9]。此外,也有学者关注了村干部领导力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有研究发现,村干部领导力在激发农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10]、增强村庄集体行动能力^[5]、推动政策有效实施^[11]、提升乡村治理绩效^[12]等方面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学者们围绕村干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开展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相关成果为理解村干部领导力对乡村治理影响的机理提供了借鉴,但仍存在三点不足。第一,研究视角上,鲜有研究从农民视角出发深入探究农民的乡村治理效能感。尽管绝大部分政策文本和学术研究都强调要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但在治理实践中农民的主体性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他们或是被代言,或是被误解,或是被忽视^[13]。第二,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对村干部领导力影响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内在机理探讨尚不充分,二者之间的逻辑“黑箱”依然存在。第三,研究方法上,囿于数据可得性,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尚待丰富。本研究认为,农民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实践主体和受益主体,其乡村治理效能感理应成为评判乡村治理是否有效的基准。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农民视角出发,在构建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样本实证分析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以期为强化村干部领导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提供实证依据

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效能感”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主要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是否有能力去组织并执行一系列行动,以取得特定成就的信念^[14]。随着学科的发展与交融,“效能感”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应用。与本研究较为接近的概念是“社会治理效能感”,即社会公众对地方社会治理效果的评价以及对社会治理的期待^[15]。根据效能感的来源,有学者将效能感划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16]。“内在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有效理解和有效参与能力的认知,“外在效能感”强调的是个体认为外部主体对其诉求做出响应的可能性,涉及公众对服务绩效的感知和对政府的信任^[17]。延伸至乡村治理领域,本研究将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定义为农民对乡村治理活动能够有效满足其需求、解决问题并带来积极变化的信念和预期。借鉴上述观点,本研究认为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既源自农民对其有效参与乡村治理能力的认知,也源于农民对村庄回应其治理诉求可能性的判断,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农民对村庄其他成员(村干部、其他村民)的认可和信任。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农民村庄认同感与农民民主参与两个方面,探讨村干部领导力如何影响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同时揭示二者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机制。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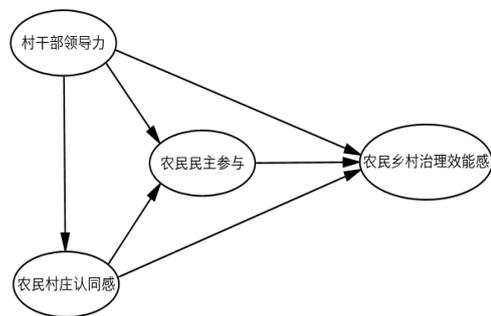


图1 概念模型

(一) 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直接影响

村干部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也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18],其领导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19]。本研究主要从示范引领、

沟通能力、执行效率和法治精神四个方面来考察村干部领导力。首先,示范引领能力是领导力的重要来源和表现^[20]。村干部作为村里的领头人,他们的行为举止对农民具有示范引领效应。一个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村干部,能够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效仿意愿,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的整体效能。例如,村干部在人居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管护等方面的率先行动,可以带动农民共同参与到乡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良好的集体行动氛围。其次,沟通能力是领导力的基础^[21]。通常来说,良好的沟通能力意味着村干部能够和上级政府、村民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顺畅的交流,准确传达政策思想,及时倾听和了解村民的需求和意见,协调各方利益,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当农民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到、问题被关注时,他们的乡村治理效能感会显著增加。再次,执行力是领导力的关键^[22]。较强的执行能力是村干部及时响应村民的需求,推动各项政策和村庄协商议事结果顺利实施落地,实现乡村治理高效运转的重要前提。在这种高效的执行过程中,农民能够切实感受到乡村治理带来的变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感。最后,领导力较强的村干部通常能够严于律己、依法办事。法治精神是领导力的基本内核和题中要义^[23]。一个具备法治精神的村干部能够确保乡村治理始终走在法治轨道上,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当农民看到村干部能够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公正无私地处理问题时,他们的乡村治理效能感也会显著增强。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₁: 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具有正向影响

(二) 农民村庄认同感的中介作用

村庄认同感是建立在村庄互动基础上的,与社会资本相互关联的,促进村庄成员利益趋同的归属情感^[24]。村干部较强的领导力能够增强农民的村庄认同感。首先,当村干部以身作则,全身心投入村庄的各项建设与发展中时,其展现出的工作热情和奉献精神会深深感染农民。这种积极的领导风范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对村庄的归属感,进而巩固其对村庄的认同感。其次,村干部通过与农民开展开放、真诚的对话,能够精准把握农民的需求、期望与关切。这种沟通方式不仅有助于村干部做出更加顺应

民意的决策,还能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与支持。农民在感受到自身诉求被重视的同时,对村庄的认同感也会相应增强。再次,高效、迅速的执行能力能够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如环境改善、设施完善、经济发展等。这些成果不仅能够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也让他们对村庄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最后,依法办事、公正廉明的村干部往往能够赢得农民的尊重和信赖,从而增加农民对村庄的认同感。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在认同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时,群体的意识会对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产生强烈的影响^[25]。对于农民而言,较强的村庄认同感对增强乡村治理效能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村庄认同感能够有效提高农民对乡村治理政策和措施的接受度和支持度,进而为政策的顺利实施和治理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其次,村庄认同感有助于增强农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村庄认同感的驱使下,农民会更加自觉地加强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有助于构建一个秩序井然、和谐稳定的村庄社会环境。最后,村庄认同感有利于增强村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从而增强农民的乡村治理效能感。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₂: 村庄认同感在村干部领导力影响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 农民民主参与的中介作用

作为乡村治理的关键角色,村干部领导力直接影响着农民对民主参与的态度和行为。首先,领导力较强的村干部通过自身的言行示范、组织教育活动和积极与农民沟通,有助于塑造农民的民主意识。其次,领导力强的村干部通常更加注重保障农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更多渠道。最后,办事公道、正直清廉的村干部能够赢得农民的广泛信任,从而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和信心。

广泛的民主参与是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重要途径。通过民主参与,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的决策质量。当农民积极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他们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多元、更贴近实际的信息和建议。这种广泛的参与不仅有助

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减少决策失误的风险,同时也能使农民更加意识到自己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从而增强他们的乡村治理效能感。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₃: 农民民主参与在村干部领导力影响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四) 村庄认同感与民主参与的链式中介作用

村庄认同感是农民民主参与的基础。当农民对自己的村庄有强烈的认同感时,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治理活动中。这种参与不仅体现了农民对村庄事务的关心和关注,也是他们行使民主权利、表达自身诉求的重要方式。同时,民主参与是乡村治理效能感增强的关键。农民可以通过参与村民会议、选举、决策等民主活动,就村庄的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确保自身的利益得到充分考虑。这种参与感和表达权能够显著增强农民的乡村治理效能感。因此,农民的村庄认同感、民主参与可能是村干部领导力与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之间关系的递推式媒介。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₄: 村干部领导力通过农民的村庄认同感和民主参与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源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 年的农业微观经济调查数据。样本涵盖了安徽、重庆、福建、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苏、山东、四川、新疆、云南、浙江在内的 15 个省(区、市)。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在每个省(区、市)选取三个县(市或区),每个县(市或区)选取三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三个村,每个村随机选取 20~25 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对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予以剔除后,最终获得了 5971 份农户问卷。在样本代表性方面,首先,样本涵盖了中国 15 个省级行政单位,且兼顾东、中、西三大地理板块。其次,样本抽样方法兼顾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样本选择相对合理。

(二) 变量测量

1. 村干部领导力

村干部领导力是村干部为实现村庄公共利益

最大化所必须具备的一系列能力。关于村干部领导力的构成要素,学界众说纷纭。如有学者将其划分为政治引领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及依法办事能力^[26],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农业发展引导力、农村建设引导力及农民致富引导力^[27]。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和中国乡村治理的具体情况,本研究从示范引领、沟通能力、执行效率和法治精神四个方面来衡量村干部领导力,并分别采用农民对本村村干部带头示范作用、干群沟通程度、协商议事结果落实程度和村干部依法办事的主观评价来表示。

2. 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

目前,鲜有研究针对农民的乡村治理效能感进行指标刻画,但关于社会治理效能感测度的研究相对丰富。其中,应用较广的是“中国社会管理评价体系”课题组提出的“中国社会治理指标体系”^[28]。该体系包含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参与六个维度的主客观测度指标。部分学者选取其中的主观评价作为衡量社会治理效能感的重要依据或关键指标^[29]。也有学者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个维度来衡量公众的社会治理效能感^[30]。此外,还有学者从生活富裕和平安宜居等维度对乡村治理效能进行了考察^[31]。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物质基础,保证乡村公共安全是农民安居乐业的首要前提,优质的公共服务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而良好的人居环境则是农业农村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因此,结合已有文献和数据可得性,本研究尝试从农民对生活富裕、公共安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四个维度的主观评价来衡量农民的乡村治理效能感。

3. 村庄认同感

村庄认同感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参考 Karasawa^[32]对组织认同的划分方式,本研究主要以农民对本村其他成员的认同度来衡量农民的村庄认同感。具体包括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对其他村民的法律观念的评价以及对干群关系的评价三个指标。

4. 民主参与程度

民主参与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相关研究^[33],本研究主要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维度来衡量农民的民主参与程度。具体采用农民对

村庄选举工作、协商议事、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对“三务”公开的感知或参与情况来衡量。

对上述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示范引领	VCL1	您认为本村村干部起到带头示范作用的程度? 1~5 分	4.205	0.858
沟通能力	VCL2	村干部与群众之间沟通程度如何? 1~5 分	4.283	0.778
执行效率	VCL3	您所在村庄开展协商议事活动时协商结果是否得到落实? 1~5 分	4.269	0.719
法治精神	VCL4	您是否认同本村村干部法治观念强、依法办事的说法? 1~5 分	4.240	0.844
生活富裕	WL1	您当前的生活水平满意度如何? 1~5 分	4.118	0.717
	WL2	您认为本村村民家庭之间收入差距怎样? 1~5 分	3.112	0.847
	WL3	您如何评价本村成年村民就业状况? 1~5 分	3.457	0.922
公共安全	PS1	生活在本村庄, 您是否有安全感? 1~5 分	4.480	0.612
	PS2	您对本村社会治安的满意度如何? 1~5 分	4.501	0.573
	PS3	您是否认同本村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基本能得到很好的调解? 1~5 分	4.327	0.613
公共服务	PG1	您对本地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如何? 1~5 分	4.259	0.77
	PG2	您对本地自来水、电力供应的满意度如何? 1~5 分	4.354	0.687
	PG3	您对本地通信网络、互联网设施服务的满意度如何? 1~5 分	4.288	0.698
	PG4	您对本地互助养老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如何? 1~5 分	4.071	0.846
	PG5	您对本村体育、文化(图书室、阅览室)等设施供给的满意度如何? 1~5 分	4.125	0.837
人居环境	RLE1	您对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的满意度如何? 1~5 分	4.174	0.815
	RLE2	您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满意度如何? 1~5 分	4.303	0.712
	RLE3	您对村容村貌的整体满意度如何? 1~5 分	4.347	0.667
村庄认同感	SVI1	您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如何? 1~5 分	4.281	0.734
	SVI2	您认为村民法律观念如何? 1~5 分	4.100	0.732
	SVI3	您觉得本村干部关系如何? 1~5 分	4.257	0.731
民主参与程度	DP1	您对最近一次民主选举的满意度如何? 1~5 分	4.359	0.715
	DP2	2022 年您参加协商议事的频率? 0 次=1, 1~2 次=2, 3~4 次=3, 4~5 次=4, 5 次以上=5	3.231	1.386
	DP3	您对本村村务、财务、党务关心程度? 1~5 分	4.024	0.941
	DP4	本村村务、财务、党务公开透明程度? 1~5 分	4.317	0.810

(三) 模型选取

本研究中村干部领导力、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村庄认同感、民主参与都是难以直接测量的潜变量,且潜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采取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前者反映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后者反映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eta = B\eta + \Gamma\xi + \zeta \quad (1)$$

用如下形式的测量方程表示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begin{cases} y = \Lambda_y\eta + \varepsilon \\ x = \Lambda_x\xi + \delta \end{cases} \quad (2)$$

其中, η 表示内生潜变量, ξ 是外生潜变量, B 、

Γ 为路径系数, 分别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矩阵和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 x 和 y 分别表示外生观测变量向量和内生观测变量向量, Λ_y 表示外生观测变量与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Λ_x 表示内生观测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ζ 、 ε 、 δ 为误差项。

四、结果分析

(一)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样本户主统计学特征如表 2 所示。从性别来看, 超过 90% 的家庭户主性别是男性, 仅有不到 10% 的女性户主。从年龄来看, 超过一半的家庭户主年龄处于 45~60 岁, 超过三分之一的年龄在 60 岁以上, 只有 12% 左右的户主年龄在 45 岁以下, 受

教育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这与当前农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学历水平偏低的现状基本吻合。从区域分布来看,调研区域覆盖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域板块,每个地域板块样本占比相对均匀。

表2 样本统计学特征

变量	类别	样本量	百分比/%
户主性别	男	5453	91.3
	女	518	8.7
户主年龄	30岁以下	59	1.0
	30~45岁(不含)	661	11.1
	45~60岁	3171	53.1
	60岁以上	2080	34.8
户主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257	4.3
	小学	2058	34.5
	初中	2652	44.4
	高中或中专	769	12.9
	大专及以上	235	3.9
地域	东部地区	1928	32.4
	中部地区	2283	38.2
	西部地区	1760	29.4

(二) 模型拟合检验结果

1. 信效度分析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量表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其中,信度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和组合信度检验(CR)来检验。收敛效度用因子载荷、KMO 值和平均方差萃取量(AVE)来检验。如表3所示,村干部领导力、村庄认同感、民主参与、生活富裕、公共安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的 Cronbach's α 系数处于 0.657~0.849,均大于 0.6 的基础标准;CR 值均大于 0.8,说明表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大于 0.6,AVE 值均大于 0.5,表明测量模型每个维度收敛效度良好。此外,为了简化模型,减少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参数,构建了二阶模型,即一阶为四因子,二阶为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经计算,一阶四因子与二阶因子的卡方比值(目标系数)为 91.261%。根据 Marsh 的研究,目标系数越接近 1 越佳^[34],因此,此二阶模型可接受。

表3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维度	变量代码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系数	CR 值	KMO 值	AVE
领导力	VCL1	0.896	0.867	0.909	0.752	0.716
	VCL2	0.797				
	VCL3	0.789				
	VCL4	0.896				
生活富裕	WL1	0.747	0.666	0.819	0.657	0.602
	WL2	0.800				
	WL3	0.780				
公共安全	PS1	0.860	0.800	0.909	0.704	0.716
	PS2	0.861				
	PS3	0.816				
公共服务	PG1	0.804	0.874	0.911	0.849	0.671
	PG2	0.835				
	PG3	0.843				
	PG4	0.809				
	PG5	0.803				
人居环境	RLE1	0.892	0.882	0.929	0.742	0.814
	RLE2	0.916				
	RLE3	0.899				
村庄认同感	SVI1	0.875	0.829	0.891	0.705	0.732
	SVI2	0.818				
	SVI3	0.872				
民主参与	DP1	0.825	0.816	0.904	0.803	0.702
	DP2	0.863				
	DP3	0.836				
	DP4	0.828				

2. 模型适配检验

表 4 呈现了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χ^2/df 的 p 值为 0.00, 小于 0.05 的临界值, 可能的原因是样本数据不完全服从正态分布。SRMR、RMSEA、GFI、AGFI、PGFI、PNFI、IFI、CFI、NFI 等重要指标都通过了检验。整体来看, 结构方程与调查数据匹配程度较为理想。

表 4 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二阶验证因素模型拟合结果

拟合指标	判断标准	实际值	模型适配度判断
χ^2/df	$p > 0.05$	0.00	否
SRMR	< 0.05	0.048	是
RMSEA	< 0.08	0.079	是
GFI	> 0.8 可接受; > 0.9 理想	0.869	是
AGFI	> 0.8 可接受; > 0.9 理想	0.839	是
PGFI	> 0.5	0.708	是
PNFI	> 0.5	0.797	是
IFI	> 0.9	0.905	是
CFI	> 0.9	0.905	是
NFI	> 0.9	0.902	是

(三) 研究假设检验

基于理论模型, 本研究运用 AMOS24.0 软件对结构模型假设进行检验。表 5 报告了结构方程模型中路径分析的结果。由结果可知, 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路径系数为正, 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村干部领导能力越强, 农民乡

村治理效能感越强, H_1 得到验证。村干部领导力正向影响农民的村庄认同感和民主参与, 同时, 农民的村庄认同感和民主参与又正向影响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 说明村庄认同感和民主参与在村干部领导力和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_2 和 H_3 得到验证。此外, 村庄认同感对民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村民对村庄认同感越强, 民主参与水平也越高, 结合 H_2 和 H_3 的结果可知, 村庄认同感和民主参与在村干部领导力影响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过程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H_4 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参考 Taylor 等^[35]的研究, 采用 Bootstrapping 对样本进行 1000 次抽取, 95% 置信区间的设定条件下, 对村干部领导力和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中介效果进行显著性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表 6), 村干部领导力与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之间的总效应为 0.579, 村庄认同感、民主参与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存在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P < 0.05$)。具体来说, 通过村庄认同感、民主参与传递的中介效应分别为 0.332、0.052, 占总中介效应的比值分别为 57.3%、9.0%; 通过村庄认同感和民主参与逐级传递的中介效应为 0.064, 占总效应的 11.1%。

表 5 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关系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差	Z 值	标准化系数	假设结果
村干部领导力→乡村治理效能感	0.131**	0.050	2.593	0.194	支持
村干部领导力→村庄认同感	0.790***	0.011	69.868	0.962	支持
村庄认同感→民主参与	0.532***	0.070	7.561	0.534	支持
村干部领导力→民主参与	0.346***	0.057	6.065	0.422	支持
村庄认同感→乡村治理效能感	0.420***	0.072	5.867	0.512	支持
民主参与→乡村治理效能感	0.152***	0.041	3.704	0.184	支持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关系	标准化系数	标准差	Z 值	下限	上限
村干部领导力→村庄认同感→乡村治理效能感	0.332***	0.089	3.730	0.200	0.477
村干部领导力→民主参与→乡村治理效能感	0.052***	0.027	1.926	0.019	0.111
村干部领导力→村庄认同感→民主参与→乡村治理效能感	0.064***	0.028	2.286	0.027	0.122
领导力→乡村治理效能感	0.131*	0.094	1.394	0.006	0.306
总效应	0.579***	0.025	23.160	0.538	0.620

(四)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受访农户包含了部分村干部或者村干

部家庭, 为了排除村干部身份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偏差, 对该部分样本予以剔除, 以进一步检验上述结

果的可靠性(表7)。由稳健性结果可知,相关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与表5基本一致,进一步证明了

结果的可靠性。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路径关系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差	Z值	标准化系数	假设结果
村干部领导力→乡村治理效能感	0.116**	0.051	2.262	0.176	支持
村干部领导力→村庄认同感	0.787***	0.012	66.458	0.962	支持
村庄认同感→民主参与	0.562***	0.074	7.544	0.565	支持
村干部领导力→民主参与	0.322***	0.060	5.362	0.396	支持
村庄认同感→乡村治理效能感	0.420***	0.077	5.482	0.515	支持
民主参与→乡村治理效能感	0.164***	0.046	3.540	0.202	支持

(五) 组群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影响的异质性,本研究基于地理区域构建了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分析的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多群组分析的估计结果

路径关系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村干部领导力→乡村治理效能感	0.282***	0.365	0.251***	0.358	0.048**	0.081
村干部领导力→村庄认同感	0.759***	0.987	0.734***	0.956	0.677***	0.921
村庄认同感→民主参与	0.609***	0.593	0.690***	0.683	0.752***	0.703
村干部领导力→民主参与	0.318***	0.372	0.206**	0.265	0.195***	0.247
村庄认同感→乡村治理效能感	0.686***	0.683	0.085**	0.093	0.449***	0.560
民主参与→乡村治理效能感	0.154***	0.173	0.251***	0.450	0.195***	0.261

多群组分析结果显示,假设检验与前文中使用全样本估计时的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但东、中、西部地区中相同属性的回归系数间存在差异,说明地理区域因素在影响路径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具体来看,村干部领导力对东部地区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可能的原因是,东、中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迅速,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农民的利益诉求也更加多元,乡村治理任务更加繁杂。在此背景下,村干部的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尤其关键。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信息相对闭塞,农村社会结构也较为稳定和单一,传统的非正式社会组织或个人在乡村治理中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村干部的领导力对这些地区的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相对较小。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15省(区、市)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村干部领导

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农民村庄认同感和民主参与在村干部领导力影响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占比分别为57.3%、9.0%;第三,农民村庄认同感和民主参与在村干部领导力与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关系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11.1%;第四,相比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更明显。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进一步选优配强村干部队伍,切实提升村干部的领导力水平。首先,应聚焦乡村发展需求和农民治理需要,完善民主选举标准和程序,确保选拔出既有能力又符合民意的村干部。其次,要持续整顿软弱涣散的村党组织。针对部分地区村党组织领导能力不强、服务意识淡薄、组织纪律松懈、带动能力不足的问题,要持续做好教育培训工作。依托“耕耘者振兴计划”等培训平台,着重提升村干部的思想道德、服务意识和发展本领,培育一批与

乡村治理现代化相协调、与现代乡村产业相适应的村干部人才队伍。再次,要完善村干部考核机制。建立以广大农民利益为中心的村干部考核机制,将农民的满意度作为村干部绩效的重要考核维度,强化村干部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定位。最后,要注重改善村干部福利待遇。让那些积极作为、敢闯敢干、勇于担当、村民认同的村干部政治上有荣誉、收入上有保障、发展上有晋升通道,最大限度提升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二是多措并举,提升农民村庄认同感。一方面,村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示范,坚持依法依规办事,增强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感。加强与农民群众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和回应农民的急难愁盼问题,努力改善干群关系。另一方面,加强在村村民之间的互动以及在外村民的沟通联络。因地制宜组织村民参加各类集体活动,如农民运动会、文艺晚会、庆祝节日、广场舞等,增进村民间的了解和友谊。引导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同时,建立有效的联络渠道,如微信群、QQ群等,通过定期向在外村民通报村庄的发展情况,方便在外村民随时了解村庄的动态。利用春节等传统节日时间段,依托村民恳谈会、座谈会等方式,鼓励村民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

三是营造良好氛围,完善民主参与机制。围绕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全过程,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具体来看,要认真执行乡村事务公开制度,确保内容、形式、时间、程序都依法依规进行,在农民群众关注的重大决策、重大事务及财务收支等问题上,做到及时、真实、全面公开,确保村务活动能为农民群众知晓。同时,要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确保农民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得到及时回应和处理。此外,要结合本村实际情况,采用务实管用的乡村治理手段和方式,如积分制、清单制、道德评议等,激发农民群众民主参与的热情和动力,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1] 胡卫卫,申文静. 技术赋能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与运行机制——基于关中 H 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5):

61-67, 75.

- [2] 崔宝玉,殷权. 数字技术提高了乡村治理水平吗?——基于“自主治理”理论视角[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3(12): 3-19.
- [3] 黄曼,庄晋财. 合作联社、产业跃迁与乡村共同富裕——江苏省丁庄村的案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6): 47-57.
- [4] 赵祥云,赵晓峰,王春凯. 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基于全国 11 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电子政务, 2024(2): 113-124.
- [5] 张立,王亚华.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7): 44-64.
- [6] WU S, CHRISTENSEN T. Corrup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China's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Main features from village and township cadr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1, 44(16): 1383-1393.
- [7] 赵仁杰,何爱平. 村干部素质、基层民主与农民收入——基于 CHIPS 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16(2): 129-152.
- [8] 李敏,姚顺波. 治理制度、村干部素质与村级治理能力[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5): 105-117.
- [9] 韩旭东,郑风田,郑淋议. 能人型村干部如何影响村庄新内源式发展: 基于全国性村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23(6): 56-65.
- [10] ZHANG M J, SHI H W, WILLIAMS L, et al.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nfluence of rural leadership on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dership identification[J]. Agriculture, 2023, 13(10): 1976.
- [11] 胡乃元,张亚亚,苏丫秋,等. 关系治理会消解村干部政策执行力吗?——基于河长制政策的实证检验[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 12(5): 112-125.
- [12] 梅继霞,向丽明. 村干部公共领导力如何影响乡村治理绩效——一个链式中介模型[J]. 管理学报, 2023, 36(4): 75-91.
- [13] 刘娟,张森,卜斯源. 乡村振兴研究述评与反思[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4): 5-31.
- [14]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2): 191-215.
- [15] 仲利娟. 社会治理效能感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基于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J]. 领导科学, 2018(14): 56-58.
- [16] VAN EIJK C, STEEN T. Why engage in co-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Mixing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6, 82(1): 28-46.
- [17] BOVAIRD T, STOKER G, JONES T, et al. Activating

- collective co-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fluencing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complex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the UK[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6, 82(1): 47-68.
- [18] 陈宝玲, 黄英, 万国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 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20(2): 277-285.
- [19] 王亚华, 舒全峰. 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领导力与公共服务动机[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9, 8(5): 23-31.
- [20] 李雪勤, 王冠.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时代内涵与绩效影响[J]. *领导科学*, 2023(4): 16-20.
- [21] 李燕萍, 苗力. 企业数字领导力的结构维度及其影响——基于中国情境的扎根理论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73(6): 125-136.
- [22] 雷青松. 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 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 *理论导刊*, 2019(11): 45-51.
- [23] 童成帅, 周向军. 提升农村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的实现理路——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分析视角[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9): 185-193.
- [24] 冀雅琴. 共同利益视角下村庄认同感构建[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 [25] TAJFEL H, TURNER J 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J].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1986, 13(3): 7-24.
- [26] 朱国城. 增强基层干部领导力是当务之急[J]. *中国领导科学*, 2019(1): 81-85.
- [27] 黎远波.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青年干部领导力提升路径分析[J]. *领导科学*, 2019(10): 87-89.
- [28] “中国社会管理评价体系”课题组, 俞可平. 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J]. *中国治理评论*, 2012(2): 2-29.
- [29] 胡荣, 林兆琦. 主观阶层认知、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2, 42(1): 109-125, 145-147.
- [30] 刘晋飞. 当代青年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CGSS2015 数据[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6): 60-66.
- [31] 赵一夫, 高道明, 周向阳, 等. 中国乡村治理发展评价报告[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1: 92-93.
- [32] KARASAWA M. Toward an assessment of social identity: The structure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in-group evaluations[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1, 30(4): 293-307.
- [33] 舒全峰. 基层民主、公共领导力与政治信任——基于 CIRS 百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7, 6(4): 71-81.
- [34] MARSH H W, HOCEVAR D. Application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self-concept: First and higher order factor models and their invariance across group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5, 97(3): 562-582.
- [35] TAYLOR A B, MACKINNON D P, TEIN J Y. Tests of the three-path mediated effect[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8, 11(2): 241-269.

责任编辑: 曾凡盛